

长沙如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从生活性服务业优势到生产性服务业跃升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付臣欢

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服务业主题召开的全国性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把目光投向长沙:这里有三一重工、山河智能等“硬核”智造,也有黑色经典、鸣鸣很忙等“出圈”全国的新消费品牌。但一个现实问题是——长沙的服务业“两翼”能否真正齐飞?比如,生产性服务业如何进一步走向专业化与价值链高端?生活性服务业的“网红流量”,又该如何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长沙正在尝试哪些解法,又面临哪些尚未突破的瓶颈?本报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深度解析。

热点面对面



专家名片

蔡景庆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推荐专家,湖南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专家,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专家名片

唐红涛 湖南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现代流通理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现状:生产性服务业基础扎实 生活性服务业优势突出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对照这两个方向,您如何看待长沙服务业的现实基础?

蔡景庆:长沙生产性服务业基础扎实,生活性服务业优势突出。前者产业底气充足、科教创新资源充沛、政策及配套充分,如长沙可依托工程机械等制造业优势进行高端化延伸。不过,也存在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层级不高,本土龙头服务型企偏少,专业化、国际化服务能力偏弱等问题。

至于生活性服务业,感受很明显:一是新型消费聚集。文旅文创、网红经济、夜经济、新消费品牌等聚集。二是传统消费旺盛。特色餐饮、便民生活圈等需求旺盛,商业载体布局充分。短板则是高端医疗和康养、高品质文体服务供给不足,普惠型优质服务需要提质扩容。

唐红涛:我来补充说说长沙的长板:新业态形成全国影响力、新模式实现制度突破、新场景深度渗透AI与数据要素。新业态大家有目共睹,是长沙服务业独特的“流量入口”。新模式方面,今年3月,长沙发布了“三新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覆盖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三大方向,为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延伸提供了政策空间。新场景上,长沙打造的覆盖研发、生产、服务全链条的“100个典型场景、25个垂类大模型”,可直接应用到生活性服务业的数字内容生产、客流预测、供应链优化等场景。

趋势:打破流量表层化现象 实现双向良性互动

记者:长沙的夜间经济、文娱IP、网红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已形成全国性影响力。关于“培育

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您认为长沙的优势在哪里?同时,这些品牌在规模化、标准化过程中,是否自然催生了生产性服务业需求?

蔡景庆:优势我概括为十二个字:活力足,底蕴深,业态强,环境优。一是长沙青年人口集聚、消费活力旺盛,夜经济繁荣,消费体量充足。二是坐拥湖湘特色文化,演艺、文娱IP不断涌现,文旅商融合优势显现。三是网红餐饮、特色消费品牌扎堆,成熟品牌的孵化、连锁与扩张效应强。四是新媒体传播能力强,城市包容开放,扶持政策完善,能够推动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打造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唐红涛:培育“中国服务”品牌,长沙核心优势在“场景原生、数据反哺”。这种“数据驱动的敏捷品牌孵化”,是AI与数据要素在生活性服务业品牌打造过程中赋能的直接体现。

同时,我认为品牌规模化、标准化,确实催生了三大生产性服务业新需求。一是基于AI的供应链优化服务,二是数字内容生产与IP运营服务,三是会展与品牌发布的专业服务。就拿第三点来说,长沙已经连续13年被评为“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城市”。支持打造多层次新品发布平台,将直接拉动会展策划、品牌传播、活动保险等生产性服务细分领域增长。

记者:除了品牌本身,生活性服务业带来的“人气”也被视为一种重要资源。有观点认为,生活性服务业繁荣带来的城市人气和年轻人流入,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重要的“软环境”。长沙目前是否有效将“流量”转化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人才池”和“需求池”?如果转化不足,卡点在哪里?

蔡景庆:长沙已初步实现消费人气向生产性服务业人才提供的轻度转化,但转化还存在不足。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繁荣催生了品牌营销、冷链物流、数字运营等配套发展,青年人口的流入也为文创、电商运营等补充了大量人员。另一方面存在人才结构不优、需求层次不高、产业协同较弱的卡点。直观的一点就是,生活性服务业嵌入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不足,网红和流量经济未有效对接工业设计、品牌包

装、市场推广等领域。

唐红涛:确实,我觉得长沙可以在技能认证体系、数据要素整合、AI工具的普及性这三方面多下功夫。比如个体餐饮、小型文娱工作室等中小生活性服务企业,可以借助AI分析工具进行客流预测、智能排班、菜品评价语义分析等。但目前是缺乏低成本、易上手的AI分析工具。这就限制了它们从“流量”中挖掘“留量”的能力,也抑制了对上游数据服务、AIaaS(软件即服务)的市场需求。

记者:国内一些城市已形成“生活性—生产性”良性互动,如杭州以电商带动数字服务,成都以文创带动设计服务。长沙能否复制或走出自己的路径?

蔡景庆:长沙可以借鉴杭州、成都的产服联动模式,走出自身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长沙文旅网红流量、文娱产业发展兴旺,具备以生活性服务业牵引生产性服务业的独特优势。

依托文旅与人气流量,有效带动数字内容创作、IP运营授权、短视频直播、会展演艺、场景策划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依托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推动文娱IP工业化、标准化开发。同时,结合网红消费品牌扩张、湘菜连锁等,催生供应链管理、标准化研发、连锁运营咨询等专业服务。但要打破流量表层化现象,强化政策引导,推动网红消费、文旅IP与数字文创、会展经济、商务服务的深度绑定,实现从流量消费向高端生产性价值服务的转化,实现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双向良性互动。

建议:瞄准服务业细分赛道 依托生产支撑制造

记者:刚刚讨论的数字内容创作这类生产性服务业,往往直接根植于生活性消费场景。这与面向工厂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不同。在您看来,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蔡景庆:简而言之,传统生产性服务“依托生产、支撑制造”,新型生产性服务“升级消费、赋能品牌”。新型生产型服务大家日常生活中直观感受更多,往往依托文旅、网红、文体休闲等服务。

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工业属性强,面向工业制造,服务工厂、车间与实体生产环节,涵盖工业研发、物流运输、设备运维、工业质检、原材料供应等内容。

记者:长沙拥有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集群,这类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较好,但发展有待提升。您认为如何更好地“依托生产、支撑制造”?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细分赛道最有可能率先突破,形成全国性竞争力?

唐红涛:我觉得最有可能率先突破是岳麓区检验检测仪器设备产业集群。这是长沙目前唯一获得国家级认证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更关键的是,整个行业正处在从“人工抽检+纸质报告”向“AI视觉检测+工业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存证”的转型风口上。并且可以依托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本地优势产业,打造行业级检验检测数据平台,训练专门的垂直类AI检测模型,对外输出“检测即服务”。

蔡景庆:我和唐教授观点相近。最具突破潜力赛道是工程机械高端检验检测与工业软件服务。我们可以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设“检测+软件”交叉学科专业,建国家级人才基地。由政府牵头建工程机械数据中心,推动龙头企业数据脱敏共享;开放测试场景,发展数据服务与算法交易。建设极端工况模拟、核心零部件检测、国际认证公共平台,主导制定行业标准。培育本土检测与工业软件龙头,构建“检测+软件+运维”的全链条服务,打造全国标杆。

关于更好地“依托生产、支撑制造”,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优化供给结构。聚焦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培育检验检测、研发设计、工业软件等高端服务,引进头部机构,打造领航企业。二是深化两业融合。建设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广“服务型制造”。三是强化要素保障。设立产业基金,加大财税支持;建人才引育机制,强化5G、算力等新基建。四是拓展开放能级。发挥中非经贸、自贸试验区优势,发展跨境物流、法律、金融服务,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坚决不做“昏、懒、庸、贪”四类官

姚选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不做“昏、懒、庸、贪”四类官,可谓精准概括了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要求和问题导向。

坚定政治立场,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其核心要求是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一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确保政治方向不偏。二要提升政治敏锐性。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发现问题,防止在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上犯糊涂。三要对标对表落实。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杜绝“表态高调、落实走调”的假忠诚。

砥砺实干精神,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其核心要求是勤勉敬业、求真务实,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尽其责。一要强化担当精神。摒弃“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二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多到基层一线察实情、听真话,避免“坐办公室听汇报、拍脑袋作决策”。三要增强效率意识。对已经定下来的事情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坚决反对拖拉扯皮,确保新时代各项工作高效运转和推进。

勇于攻坚克难,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其核心要求是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硬脊梁、真本事。一要敢于直面矛盾。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硬骨头、深水区,不能绕道走、往外推,要主动接“烫手山芋”,当“热锅上的蚂蚁”。二要善于开拓创新。破除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运用新理念、新方法解决大国发展中的新问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三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既做显功也做潜功,坚决反对华而不实、数据造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永葆清廉本色,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其核心要求是清正廉洁、公私分明,守住权力关、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一要正确行使权力。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时刻警惕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权力陷阱。二要净化“三圈”。严格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警惕别有用心之人特别是异性的“围猎”,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三要注重家风建设。管住管好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任何特权现象,筑牢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和身边人防线。【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理响千字文

小巷回声 议出小巷新生

熊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芙蓉南路社区以“雨邻有约·小巷回声”议事机制为抓手,走出一条以协商促共治、以共治促新生的基层治理新路。

以阵地聚力,激活空间“新效能”。盘活“城市隙地”打造多元共享融合阵地,将闲置凉亭升级为小巷议事角与工会驿站,兼顾居民与新就业群体需求。组建小巷红骑手队伍,骑手及时上报楼道杂物、破损井盖等隐患,社区快速处置,让街角“金角银边”成为凝聚人心、服务民生的幸福港湾,推动治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以机制赋能,建强共治“新力量”。组建小巷主人队伍,吸纳人大代表、党员群众骨干、统战对象、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社区某物业突发退场,社区联合小巷主人紧急接管、清运垃圾、代缴电费,快速选聘新物业。组建栋委会,变“单向管理”为“多元协同”,用微机制激活微力量,解决微问题。

以议事破题,解决家门口“烦心事”。社区搭建小巷会客厅,把协商搬到居民家门口,直面金盆公寓护坡开裂渗水、消防系统瘫痪等急难愁盼,组织职能部门、居民、辖区单位、物业多方发力,全程监督督查整改,把“民声”转化为“民生”,实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

小巷虽小,连着民心;回声虽微,关乎大局。“小巷回声”以“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理念为遵循,以党建引领聚合合力,以协商共治解民忧,把群众的呼声变为实践的掌声。(作者系雨花区东塘街道芙蓉南路社区党总支书记)

就是这个理

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

田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指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

民营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是我国宪法规定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战略部署在刑事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新时代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扎实推进民营企业刑法平等保护要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结合。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是相互对应的法学范畴,形式平等重在法律规范统一,实质平等重在法律结果公正。所谓形式平等,是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刑法保护上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在罪刑设置、保护范围、保护程度等方面,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一致性、对等性、均衡性。我国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逐步加强对民营企业刑法平等保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中犯罪主体所属单位必须是国有公司、企业或事业单位的限定,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成为上述犯罪的主体。形式平等必须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如果过分强调形式平等,就有可能走向极端、僵化和教条。比如,如果主张将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可以分别构成的“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都“扯平拉直”,甚至主张对上述犯罪不再分开设置,不论是国有企业犯罪还是民营企业犯罪都适用相同的刑法条文,那么,上述主张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投资主体、资源获取、管理模式、承载的社会责任等方面存在客观差距,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具有国家公权力行使者的身份,如果无视这些重大差别,忽视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压力和发展困境,取消上述“三对六种”犯罪的对应性设置,表面上和形式上是达到了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刑法保护的完全同等,但是却缺少了内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而在实质上却是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的。所以,在坚持形式平等的基础上,更要追求实质平等。所谓实质平等,是指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刑法平等保护上,不仅要在外在形式上具有平等性,而且要在深层次的内在机理和逻辑结构上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是实体平等与程序平等相结合。实体与程序是法学理论中的对应范畴,其中,实体是指有关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的规定,程序是实现法律关系主体法律权利义务的程序上的保障性规定。具体到民营企业刑法平等保护的论题上,所谓实体平等,是指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等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权益保护与责任承担在立法创制上必须符合公平正义;所谓程序平等,则是指为了实现上述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权益保护和责任承担,在程序上也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程序平等是实现实体平等的保障。有些时候,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是实体认定上出现了问题,而是源于办案程序不规范、滥用或过度采取强制措施。比如,办案单位非法或者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的财产,非法占有、处置、毁坏

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民营企业的财产,等等。因此,必须强化程序平等意识,以程序规范制约公权力的行使,让民营企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是立法平等与司法平等相结合。立法与司法是前后衔接的两个环节。所谓立法平等,是指在立法环节严格贯彻落实平等保护原则,在入罪标准上坚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平等法律地位,在犯罪客体的保护范围、犯罪主体的设立以及法定刑配置等方面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所谓司法平等,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严格贯彻落实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不能因为涉案主体是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而有所偏私、徇私枉法。但是,坚持司法平等与法官依职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不矛盾的。刑法条文的罪状描述往往具有概括性、简洁性的特点,而且在不同犯罪的法定刑配置上有着不同的刑种和法定刑幅度可供选择,这些都需要办案法官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科学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衡量和取舍,以实现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科学的司法活动,还能纠正立法上的某些不足。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单位行贿罪”等犯罪中,国有企业犯罪和民营企业犯罪适用相同的罪状和法定刑配置,这实际上与前文所述的事实平等有所抵牾。因此,司法活动就大有用武之地,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触犯相同的犯罪时,通过考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具体犯罪事实及其社会危害性等客观情况,对它们分别选择适用不同的刑种,或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选择适用不同的刑期,从而实现实质平等。(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法学院)



释文:山不让坐 篆刻/徐坦



并不达泉,则犹不掘也;一步未至,则犹不往也。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极言 漫画/吴志立